



(一)

五十年前,我就从刘诗昆演奏的《卖杂货》和《旱天雷》知道了陈培勋这个名字。之后,又听到了陈先生的另外两首钢琴曲《思春》和《双飞蝴蝶变奏曲》。那时,我还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一个初中生。陈培勋对于我只是这些钢琴曲的作者名字,顶多就是在院子里远远望去的一位不苟言笑的教授的身影。那时,音乐学院大院“处处《卖杂货》,天天《旱天雷》”,还有从附中到大学几乎所有钢琴音乐会上都能听到的《思春》和《双飞蝴蝶变奏曲》。这些充满浓郁广东风情的钢琴曲,以熟悉的旋律、精致的和声和独特的织体风靡全国。1978年,陈师又根据广东音乐《平湖秋月》创作了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同名钢琴曲,与前四首合称为《广东乐曲五首》。这些乐曲始终是许多音乐会和钢琴比赛的保留曲目,最近还出现在郎朗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会节目单和他新近录制的唱片《黄河之子》中。这五首乐曲,是中国钢琴音乐中的巅峰级文献。

1964年9月,已经是音乐学院作曲系三年级学生的我,迎来了期待已久的配器课,任课老师正是我仰慕多年的陈培勋教授。遗憾的是,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“文革”前夕。

开始一个月,我们配器课虽然受到当时禁止使用“封、资、修”教材的限制,但课堂教学大体还能正常进行。到10月,音乐学院按照北京市委要求,全院到通县参加农村“四清”大会战,全部课程都中断了。在“四清”中,音乐学院和北京市法院、制药厂以及焦化厂的“四清”工作组混编,所幸,音乐学院只有我们师生俩分在一组,这样,我和陈师同组工作、同室居住、同桌就餐达8个月。

我们参加四清的地方在北京通县六合大队疃里生产队(今通州区宋庄镇疃里村)。1964年10月到1965年5月,我和陈老师就在这里参加“四清”。起初他负责会议记录,我负责青年工作,后来一起参加疃里村史的写作。1965年初,从邻村调来作曲系的同

怀念恩师陈培勋先生

□ 鲍元恺

学张以达,又逢音乐研究所的杨荫浏、曹安和、李元庆、李纯一和吴钊参加后期四清,也都在疃里加入到我们这个村史写作组。

一对作曲师生朝夕相处,话题自然还是作曲。没有上完的课,在“四清”的间隙继续。我在这里从陈老师那里学到的经验、招数,远远多于当时禁锢状态下的学校课堂。连续8个月的“私人授课”——铜管组的音量均衡与共鸣、木管组的音色叠置与交叉、整体音色的横向布局……都在这与交响乐无缘的时段、无缘的地方悄悄进行着。

1965年5月,四清结束,我们班又被安排到农村“开门办学”,校舍在香山卧佛寺和万安公墓东北的太舟坞大队(现海淀区温泉镇太舟坞村)。陈老师的配器课接着“四清”前的课程在这里继续。但是,他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实施教学,公开油印出来的教学谱例完全改成了《红色娘子军》《白毛女》《人民英雄纪念碑》这些中国的“革命的”作品。当然,他使用这些谱例,不完全是当作范例。“这一段如果把1、2小提琴去掉,只留下中提琴,效果会更好。”“这个和弦当中的圆号,如果1、3同度,2、4同度,会比分成四个声部音响更饱满。”这样的修正意见,在我们的课上经常会听到。有趣的是,陈师给我们留的配器作业因为不必公开,则全部是西方音乐,与上课的用的公开谱例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印象最深的是贝多芬第一奏鸣曲第一乐章、第五奏鸣曲第一乐章、第八奏鸣曲第一二乐章,格里格《挪威舞曲》,肖邦《A大调波兰舞曲》,柴科夫斯基《一月》《四月》,德彪西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《月光》。这些作业是他多年积累下来的“看家”习题。

1966年6月初,陈师绞尽脑汁在夹缝中生存的配器课,随着“文革”的爆发而彻底结束了。

(二)

陈培勋1922年出生在香港,小时读的是英文学校,因此他的英文很好,中文却难免捉襟见肘。这阻碍了他的汉语表述能力和中

文写作能力,致使他从事配器教学一生,却没有出版过一部完整的配器教材,是为憾事。在配器课上,他说到乐器名和音乐术语,既不用中文和通用的意大利语,更不用当时我们熟悉的俄语,而是用他惯用的英语。我们师生间曾经在课上为此磨合了好一段时间。80年代以后,他到香港用英语从事作曲教学,却得心应手。

熟悉陈培勋的马思聪先生曾说,陈培勋在香港的名字叫做陈贝芬,是成年之后他自己起的,意欲成为中国的贝多芬。后来到广东曲江(今韶关)才依粤语发音将 Chan Pui Feng 的中文名字写做陈培勋。

1941年,陈培勋在香港居民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弹钢琴。香港、广州相继失守后,服务团撤离到曲江,此后在这里成立了广东艺术专科学校。陈培勋的第一部作品——舞剧音乐《宝塔与牌坊》,就是在广东艺专为舞蹈教学弹钢琴时,应吴晓邦先生和梁伦先生之约创作的。那时,曲江只有两台钢琴,一台在基督教青年会,马思聪当时就在那里举办音乐会。另一台是艺专从地方教会买来的。这部舞剧的演出,就是由陈培勋在这架钢琴上演奏音乐的。

1943年,陈培勋到了重庆,在马国亮领导,马思聪、郑志声、林声翕等先后担任指挥的中华交响乐团担任低音提琴乐手。后来他还兼任过定音鼓手。他曾在课上说过,从莫扎特到法雅的很多作品的总谱,就是担任乐团乐手的时候背下的。工作之余,为了生活,他还曾在舞厅做过钢琴手,即兴演奏是他的绝活儿,还弹得一手相当地道的爵士乐。他和另一位音乐家卓明理,在重庆是当时有名的“洋琴鬼”。

在重庆期间,因为中华交响乐团的乐手多在育才学校兼课,陈培勋结识了在育才主管教务的李凌先生。这位在解放后担任中央乐团团长的老朋友,后来在创作上给予陈师很多切实的帮助。

1950年,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,陈师即到音乐学院任教。他担任的第一门课不是管弦乐配器,而是“军乐配器”。在建国初期,大家认为只有雄壮激昂的军乐,才能表现革命的激情和革命军队的步伐。年轻的陈师对军乐配器的教学乐此不疲。这个期间,陈师还认真阅读了一些英文的配器法书籍。

不久后,苏联专家古洛夫和阿拉波夫相继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和配器。配器班上,陈师成绩突出。他和施咏康、苏夏的作业经常被当作示范教学的范例。这一阶段,陈师缩写过大量总谱,其中最多的是柴科夫斯基的作品。苏夏先生看过他写的“柴六”缩谱,每组乐器的分配,八度、同度的重复,都标示得清清楚楚。后来,吴祖强和杜鸣心从苏联留学归来,带回了他们在苏联学习期间的和声、配器习题连带老师的批改记录。这些后来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。陈师也从中吸取了配器教学的许多经验,承袭了许多习题。

陈师多方面的音乐实践和丰富的艺术积累,为他的创作和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(三)

1995年,香港雨果公司出版的陈培勋交响音乐专辑唱片《我的祖国》,包含了陈师交响音乐的三部代表作:

交响诗《心潮逐浪高》;

第一交响乐《我的祖国》I.前奏曲 咏雪; II.英雄的诗篇 娄山关; III.叙事曲 追怀 展望与前途;

第二交响乐《清明祭》I.烈士碑前; II.忠魂舞; III.遗愿化宏图

陈师的第一交响乐《我的祖国》写于1960至1964年间,初名《江山如此多娇》,“文革”期间总谱遗失。1976年重写第一和第二乐章,1989年增写第三乐章并更名为《我的祖国》。这部交响曲大气磅礴,构思宏伟,是当代中国交响曲作品的珍品。

第二交响乐《清明祭》作于1980年,献给文化大革命中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们。1980年获得第一届全国交响乐作品比赛优秀奖。连续演奏的三个乐章的内容皆来自《天安门诗抄》。

表面上看,陈师特才傲物,不问政治。但从他的这些交响曲的内容看,陈师绝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生活、没有政治头脑的人。

“文革”后,陈老师到香港从事作曲教学,我们的联系很少。但是他每有新的总谱或唱片出版,总要托苏夏老师送给我。

这个时期,陈师创作了许多在中国大陆鲜为人知的音乐作品:

小交响曲《迎春》(第一乐章:抒情的前奏曲《迎春》;第二乐章:交响舞曲之一《红梅》;第三乐章:间奏曲——两首云南民歌;第四乐章:交响舞曲之二《春节庆会》,1982年);

高胡协奏曲《广东音乐主题》(1983年);

乐队与合唱《儿童节序曲》(与叶惠康合作,1984年);

小交响曲《青年》(1986年);

1996年,雨果唱片公司录制了他的管弦乐《欢乐的春江花月夜》。

1998年6月,中国交响乐团举行我和杨立青、金湘的音乐会。那天,他由苏夏老师搀扶着到北京音乐厅。他说:我就是来听你们的作品的。

1999年,我到南线阁寓所看望中风的陈师,那时,他的言语和行动已经出现障碍。

2007年9月上旬,在天津遇到我的作曲老师苏夏先生,从他那里知道,陈师已离开人世。9月底,为了解陈师离世的准确时间和地点,我到北京走访了几位知情人。

从苏夏先生那里知道,陈师的最后时刻是在深圳海滨广场福田阁的寓所度过的。

陈师忌日是从梁茂春教授那里得知的。梁教授根据他居住的音乐学院宿舍楼张贴过的一张讣告,确定陈师离世的时间是一年前的2月25日。令人不解的是,至今,所有媒体都没有关于他去世的报道。

黄飞立先生告诉我,他是前几天从黄安伦的电话中知道陈师过世的消息的。而远在加拿大的黄安伦又是从我个人在网络上发布的消息中知道的。

90高龄的黄先生表示,一个在钢琴和管弦乐两方面的创作都做出了巨大贡献,又培养了几代作曲家的艺术大师,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。令人遗憾!他说,像陈培勋这样为中国音乐事业做出这样杰出贡献的人,难道不应当隆重地纪念他、宣传他,让大家学习他吗?

鮑元愷 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

(责任编辑 张宁)